雪珥 - 中国改革史系列之

地　域　卷

雪珥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雪珥 - 中国改革史系列

地域卷

《天子脚下——晚清政局与天津特区对外开放》

人物卷

《绝版恭亲王——风口浪尖上的晚清改革舵手》

年代卷

《国运 1909——晚清帝国的改革突围》

事件卷

《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 年的民生与民声》

雪珥，本名蒋文胜，澳大利亚籍华人、太平绅士（Justice of the Peace），中国改革史及战略史学者。

1991 年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曾在中国担任公务员 9 年，获得中国律师资格；中国最早的财经专栏作家之一，后以此职业身份获得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曾在澳中两国经营企业十多年，现已退出工商界，专事研究。

自 2006 年开始中国改革史的系统研究及写作，同时研究中国战略史及国际关系，重点是南海战略、新疆战略及中美、中澳关系。

目前担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西悉尼大学澳中文化艺术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恭王府特聘研究员兼近代改革研究室主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家族企业》杂志顾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长江商学院等多家商学院 EMBA 授课教授；《中国经营报》《国家人文历史》及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多家报刊专栏作家。

责任编辑：吴晓梅
助理编辑：马　绒
书籍设计：瞿中华

人像摄影：王宏

天　子　脚　下

晚清政局与天津特区对外开放

雪珥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子脚下：晚清政局与天津特区对外开放 / 雪珥著.
—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153-4977-0

Ⅰ. ①天… Ⅱ. ①雪… Ⅲ. ①政治改革—研究—中国—1860～1890 Ⅳ.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1308号

总 策 划：皮　钧
监　　制：彭　岩
营销策划：王　靖
媒体运营：孙　博
推广编辑：汪　琳

责任编辑：吴晓梅
助理编辑：马　绒
书籍设计：瞿中华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图书营销：010-64465498
图书媒体运营：010-57350393
编辑部：010-57350521
印刷：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 × 1230　1/32
印张：13.75
字数：400千字
版次：2017年8月北京第1版
印次：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80.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 总序 —

改革面对的是没有“剧透”的历史

——改革的逻辑、改革的对象与改革的边界——

皮钧

任何改革都是有逻辑、有对象，也是有边界的。但兹事体大，旁观者难以看清，非躬身入局者，不可察也！

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保留了相当珍贵的文献。但从实践角度来看，可以“文人史”与“现实史”划分之。

“文人史”很像今天的网络文章，多为借史抒怀，虽不乏文彩灿然者，却往往隔靴搔痒，见表不见里，疑伪亦疑真，难以直指历史本来面目：为尊者讳，不过是为胜者旌名，但于历史之规律，往往淹没其中。即使是孔子的春秋笔法，“笔则笔、削则削”，也只能说是春秋时代发生的事情，与孔子的道德观有出入

而已，但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直接内在联系。此种叙史方式占了中国史书的 90%以上。后人读之，莫名其理；但美过往，无益将来。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指的就是这类史书。

“现实史”之所以难写，一方面是关键文献不足，特别是涉及最高决策层的东西，大家都讳莫如深，导致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在史书中成了“神话”，无头无尾、无因无果。另一方面是作者见识不足，不能对那些在历史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伟大人物所面临的形势进行“归位思考”，特别是在重要转折时期，当时人、当时事的独到眼光与判断，不一定都和盘托出。后人必须从史迹中找出其基本逻辑和本源思考，并还原到历史场景中去，才能看清本真。否则后人无法从历史中汲取有价值的经验与教训。这就需要绝大的现实眼光与时代眼光（注意：不是历史眼光，看了剧透的人是没有资格评论历史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恺撒的《高卢战记》、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能够成为真正不朽的历史巨著的原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既是一篇光辉的哲学文献，又是一篇光辉的历史文献，其意同也。

“改革史”尤其如此。

本书的作者雪珥先生曾先后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工作，又恰逢改革开放之伟大时代，亲历了许多事件，并与诸多决策者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加之本人酷爱历史，中英文俱佳，又练就一支妙笔，故而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中挑出“改革史”这一特殊题材，生成经世致用之佳作。

改革的逻辑

改革都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进行的——改革往往不是结果导向，而是问题导向——没有问题谁改革啊？！

找出改革的出发点和根本原因，才是改革史研究的历史使命，而不是仅仅看结果。从中国历史上看，改革者往往都是以悲剧人物收场。在中国这样一个“成王败寇”文化盛行的场景下，没有几个人愿意认真研究改革者尤其是那些“失败”了的改革者。而历史规律往往提醒我们，要学会在前人停止的地方再出发，而不是重新发明“轮子”。

雪珥先生的改革史恰恰遵循了这一点：《国运 1909》《辛亥：计划外革命》等，都是按照这个逻辑展开的。不仅详述了当时的史实，更重要的是认真考察了改革的推动者即当事人的思考与行动。很多结论都值得深思：如清末的宪政并未改变中央集权的模式，反而是“集权者的尺码从 XXL 换成了地方无数小 S 号”。这个 100 多年前改革者面临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在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中又认真提出，只能说明需要改革的问题并没有在百年前的革命中解决，甚至，很多问题不是革命能够解决的。

因此，改革的落脚点一定是问题，离开问题的改革都是臆想。

改革的对象

改革的对象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而是“筹码阶层”。

古往今来，人们往往把改革的阻力笼统归于体制因素或是既得利益集团，既不准确，也不科学。因为这样模糊的表达，恰恰说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有些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改革的人，往往断的是毛发！改革的对象不是孤立的东西，不是虚幻的概念，而是存在于各个领域，是一些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活生生的人——任何离开人的研究都是歧途。

事实上，改革的对象，是“筹码阶层”。

所谓“筹码阶层”，就是这样一群人：除了被施舍或者占有，他们没有能力生产出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他们认为自己是一种“筹码”，可以通过讨价还价任意“卖出”自己。他们不是普通的懒汉——懒汉只是好吃懒做，而他们崇尚投机取巧，并且把满足私欲的一切行为也冠以“劳动”这样显贵的名号；他们也不是普通的搭便车的人——搭便车的人只是在占便宜，而他们却千方百计让别人付出改革的成本，自己获取改革的利润。他们没有自己的目标和追求，只是看人下注、因人成事。他们不是发展的动力，却自认为是成功的筹码，甚至还要独占胜利的荣光。本质上他们是一个“不劳而获”的阶层，但平时在人群中却不易被识别和区分，甚至很多事业被葬送的时候，还难以被人察

觉。这才是真正的危险之处！

“筹码阶层”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是创新的最大敌人，是现代化发展的严重障碍，也是懒政怠政的主要人群。他们是个人私欲的奴隶，却要摆出历史主人的派头；没有为历史开道的能力，却要享受创造历史的荣光。其实，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对此早有深刻洞察。范雎在其著名的《献秦昭王书》中就深刻指出：“善厚家者取之于国，善厚国者取之于诸侯。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为其割荣也。”所以昭王罢黜尸位素餐的穰侯而起用一代名相范雎后，史载：“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如果不能在改革中摆脱“筹码阶层”的束缚，任何政治进步所赢得的民心都将被挥霍殆尽。

我们在雪珥先生的书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阶层”的种种嘴脸。今天所遇到的官僚体制、政商关系、社会板结、文化虚无、奢侈浪费，都能够在百年前清末的改革中看到重重迷影。

但是，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历经百年的变革，也并没有取得对这个阶层改革的实效。

改革的边界

改革是有边界的——底线就是避免“始变终乱”，从而引发革命。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存续”，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颠覆”。二者的目标和手段完全不同。因为“改坏了的改革”而引发革命，这在历史上不在少数。但此中得失是不能在革命中寻找的，只能在改革中寻找。因为革命者并不关心改革者关心的问题，二者立场大相径庭。旧王朝的解体和旧体制的崩塌，并不必然带来问题的解决，甚至可能以新的方式在新体制中继续存在。

改革如马拉松，往往需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够看清其本质。好在中国的历史足够悠久，后人可以跨三代研究（正反合）。如宋代研究唐朝灭亡的原因，认为“安史之乱”是唐朝衰败的根源，由此把改革的矛头直指“节度使”制度，从而形成“抬文抑武”的体制。结果宋朝倒没有亡于内乱，但因这种“羸弱”的体制使得国力如纸，最终竟亡于外患。后人不一定都能看清前朝的问题，真实原因往往并不那么显而易见！

雪珥先生的改革史之所以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意义，即在于尝试厘清上述问题。

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视角看，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也是 1840 年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大转折的组成部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没有找到复兴的道路，却引发了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是中国共产党理顺了清末改革者与革命者留下的烂摊子——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现代性大转折的组成部分，很多问题，其实在清末就已经显现。我们现在要解的诸多难题，甚至可以说与百年前是同一套“试卷”，只不过当时

很多题目还没有来得及作答。

近代史离今人很近，从情感和认识上更易引起共鸣，殷鉴不远，其意可追。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的国内外局势和经济社会发展又形成了许多新的特点，“将改革进行到底”的难度可想而知。

总之，中国是一个改革大国，“文明早起、政治早熟”，有着极为丰富的改革实践，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不能比拟的。加之改革往往与改革者的情怀、命运环环相扣，与国家的盛衰兴亡紧密相连，因此成为中国文化中的独有的道统与意象。加之改革样本丰富，所有的探索对当下的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都是有极大帮助的。

真正的改革者从来都承认创造的当代性和主动性，并把历史看作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的创造性劳动的历史。真正的改革者也正是在这种实践中克服了狭隘的、地域的意识，而成为具有世界和历史意识的自觉的人。后人完全可以在前人思考与实践停止的地方继续探索——这是我们出版这套改革史的“初心”。

2017 年 7 月 1 日晨于京华三生楼

— 总自序 —

珍惜改革，珍惜改革者

雪珥

1

曾有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政坛老前辈，在聊天时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的研究与写作，有影射吗？”

我几乎不假思索就回答：“当然有影射。没有影射，我就不写了。”

前辈一愣，他大约没有想到有人会痛快承认影射，毕竟大多数人对此是只做不说，甚至只做不认。

我解释说：“我觉得，历史研究的作用就是资治通鉴，要服务于当下的。我的研究向来是‘问题导向’，带着针对性做问题

研究。我的‘影射’，在于确定问题的所在，并非结论先行，结论应该根据史料来判断。这样的‘影射’，才是资治通鉴。”

我再补充：“我的研究，尤其是传播，将受众确定为政商两界的精英，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这些精英都是行过万里路、读过万卷书的，那种结论先行的‘影射’，绝无可能赢得他们的丝毫关注。我的所谓的‘影射’，无非就是确定贴近现实的研究课题。”

前辈听了，若有所思。

2

研究改革史，对我来说，一度仅仅是个人爱好而已。

初衷其实很简单：走出校园后，我的生活轨迹完全是在政、商两界从事各种实务，见证、参与了如火如荼的改革实践，亲历了不少风雨雷电，亦因此养成了闲暇之余试图跳出事外琢磨改革逻辑的习惯。大约是长期从事实操的关系，我相当厌烦那种跳跃式的、缺乏行为逻辑链条的空头讲章，总是思考：既然历史如同涓涓长河，改朝换代的“抽刀”究竟能有多少“断水”功效？以“砸烂一个旧世界”为基本手段，真能如愿“建设一个新世界”吗？我总觉得，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除了那些政治挂帅的宏大叙述之外，应该存在着更多的“技术操盘”细节，记载了前人的思考、探索，对当下更具有“资治通鉴”的意义。

带着这样的初衷，从“技术操盘”入手，我开始了这个最初完全自娱的探究。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没想到自己的博客能有这么多“粉丝”；

没想到知名的老牌出版社会主动联络出书；

没想到多位“中堂大人”们能多方力荐；

没想到商学院 EMBA 的企业家学员们能如此喜欢改革史课程……

我发现，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技术操盘”的人，并不在少数，尤其在政商两界精英中非常普遍。这些当家人、挑担者，在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实践后，最深的体验就是办事之难绝非坐在象牙塔内冥想那么简便、那么轻佻。

中国改革进展至今，堪称已登上“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巅，既有的各种理论都显出了疲态，而静下心来在前人的改革探索中披沙沥金，或许是个更为可行的“笨”办法。这大约就是近年对晚清改革的研究突然成为显学的关键动力，我为自己无意间在其中扮演了推手角色颇感自豪。

这些年来，媒体给我安了不少头衔，基本集中在“历史”领域。而在我自己看来，我研究的就是公共管理，无非更多的是从历史维度入手。这些年，无论是周游列国，还是在国内探亲访友，我打交道最多的，依然是政界、商界人士，听他们谈最为鲜活的当地政经情况。在我看来，这不仅是“接地气”，也是“接天线”。这种习惯，一方面是我自己的人生阅历及既有朋友圈的惯性；另

一方面也是因为政、商两界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及主要受众群体。

精力有限，我给自己的研究定位了一个基本传播路径：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其中一个主要渠道，就是在一些顶尖商学院开设EMBA课程或EDP课程，讲授中国改革史或政商关系演变史。商学院学员无疑是中国社会的精英，至少是成功人士。商学院的课堂亦是竞争最为严酷的：不仅教授要给学员们打分，学员们也给教授打分，优胜劣汰，任何的忽悠都会被无情地碾碎，这给了教授者巨大的压力。学员们不仅事业有成，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其中大多数人读书之广、思考之深，亦已超过不少教授。

在这样的课堂上，靠发牢骚、靠做作的批判根本难以立足，解决问题，至少直面问题、解答问题，是必须具备的能力。我曾经应邀在某商学院为一位著名法学家的跨班级讲座充当点评嘉宾。这是我十分钦佩和敬仰的一位大家，我也基本认可他对中国现实的诸多批判，但我在点评时，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与“看到问题”相比，更难的是“解决问题”；与充当批判者、旁观者相比，更难的是做实践者、挑担者；与扮演“思想家”“哲学家”相比，更难的是扮演“工程师”；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最好是少些云里雾里的“坐而论道”，多一些脚踏实地的“起而行之”。值得欣慰的是，这位大家及听课的大多数学员们，都认同我的意见。

这些年我最为自豪的是，在诸多商学院里，我多是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

3

从“技术操盘”入手研究中国改革史，“问题导向”是必需的。

对我最有影响力的“问题导向”，首先是：中国近代国运之衰，真是因为“闭关锁国”吗？

“闭关锁国”，俨然是国人对近代史的基本认知前提，并由此衍生出国人对近代史的“两蛋”批评：不是“笨蛋”（愚昧），就是“坏蛋”（反动）。国史上主动的“闭关锁国”，主要在于明清两朝。明朝的海禁，始于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下达“片板不得入海”的政策，到隆庆元年（1567）“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实行“隆庆开关”，实施了近 200 年。清初的海禁，始于顺治十二年（1655）“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终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设立闽粤江浙 4 个海关，为期 29 年。两者合计约 230 年，此后直到 1949 年，再无主动的闭关海禁政策。

无论明清，中国在世界经济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那一轮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参与者。清朝中叶，对华贸易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 90% 以上利润的来源；在沙俄全国对外贸易中，对华贸易占比达到了 7.3%~8.3%，关税占比高达 20.4%~38.5%；争夺毛皮这一中国进口的大宗商品市场，也成为列强在北美殖民地进行博弈的主要经济动力……外贸为清帝国带来了巨额白银，根据美国汉学家、大清国海关高级干部马（H.B.Morse）在《中华帝